

党史 资料

丛刊

一九八四年第四辑

党史资料丛刊

一九八四年第四辑

(总第二十一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字数 124,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600

书号 3074·707 定价 0.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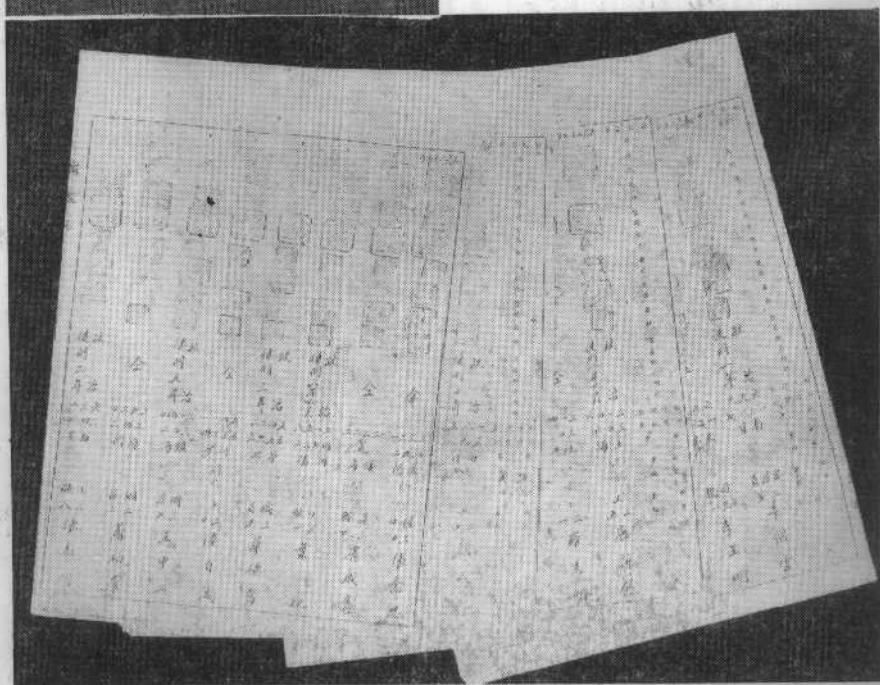
内部发行



郑文道烈士像

DH 85/03

上海解放时，从上海监狱营
救出的部分难友名册。



D239/8:5

5809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第八四号

第四集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总第二十一辑)

忆 录

DH85/03

江苏省委等

- 一九三三年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些情况……袁孟超(3)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南京地下工作
片断回忆……刘季平(8)

武装斗争和经济工作

- 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王 德(19)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陈文其 刘涤生(30)
忆黄桥决战中的一份军事情报……张乃康(38)
掩护美国飞行员脱险记……李兆华(41)

重 研 究

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蜕变、消失

- 从汪复职到汪蒋合流(下)……任建树(45)
关于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若干
问题的考订……金再及(59)
五卅运动中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日期
质疑……仓大放(68)
新四军江南首战地名考……王辅一(70)
解放前夜上海监狱里的斗争
……上海公安史料征集办公室(72)

七 史 资 料

-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一)……吴 昊(81)

目 录

关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孙其明(95)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军事代表团

访俄情况 A.И.卡尔图诺娃(99)

人 物

瞿秋白传 陈铁健(108)

第五章 走向光明的使者

我党情报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郑文道 钱 明 方知达 倪之璞(130)

关于龙华二十四烈士中的

刘争同志 张先根 尤 亮(134)

学术动态

全国抗日根据地讨论会简述 姜 尚(137)

文 摘

毛泽东同志谈重庆谈判(18), “牺牲带”(29), 军调部

我方成员名单(71), 林彪不赞成和平解放北平(98)

读者来信摘登

关于江苏省委“妇委”的补充(陈修良), 关于一九二七年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交通员(姚鹤年), 关于“文委”和“社联”成立时间补正(朱时雨), 关于《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几点补正(朱华), 说明与更正(杨雪林、戚铮音、张梦莹)

总目录(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 (159)

封面设计 孙宝堂

D2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 目录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总第二十一辑)

忆 录

DH85/03

江苏省委等

一九三三年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些情况……袁孟超(3)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南京地下工作

片断回忆……刘季平(8)

武装斗争和经济工作

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王 德(19)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陈文其 刘涤生(30)

忆黄桥决战中的一份军事情报……张乃康(38)

掩护美国飞行员脱险记……李兆华(41)

专题研究

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蜕变、消失

——从汪复职到汪蒋合流(下)……任建树(45)

关于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若干

问题的考订……金再及(59)

五卅运动中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日期

质疑……仓大放(68)

新四军江南首战地名考……王辅一(70)

解放前夜上海监狱里的斗争

……上海公安史料征集办公室(72)

党史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一)……吴 昊(81)

目 录

关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孙其明(95)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军事代表团

访俄情况 A.И.卡尔图诺娃(99)

人 物

瞿秋白传 陈铁健(108)

第五章 走向光明的使者

我党情报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郑文道 钱 明 方知达 倪之璞(130)

关于龙华二十四烈士中的

刘争同志 张先根 尤 亮(134)

学术动态

全国抗日根据地讨论会简述 姜 尚(137)

文 摘

毛泽东同志谈重庆谈判(78), “牺牲带”(29), 军调部

我方成员名单(71), 林彪不赞成和平解放北平(98)

读者来信摘登

关于江苏省委“妇委”的补充(陈修良), 关于一九二七年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交通员(姚鹤年), 关于“文委”和“社联”成立时间补正(朱时雨), 关于《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几点补正(朱华), 说明与更正(杨雪林、戚铮音、张梦莹)

总目录(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 (150)

封面设计 孙宝堂

一九三三年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些情况

袁 孟 超

一九三二年八月，我从苏联伯力远东共产主义大学被调回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国同志开设的工会工作训练班，参加的有：吴玉章、林伯渠、熊天荆、徐时惠、傅继英、袁孟超（即袁家镛）、盛忠亮等。盛任小组翻译，我任小组长，历时两个月结业。

一九三三年初，我从苏联回国，抵达上海。这时中央已迁往苏区，我在中央局设在沪西小沙渡路（现西康路）的一个机关接上了关系，住机关的是夏之栩和她的母亲夏娘娘。中央原来安排我到鄂豫皖苏区去接替沈泽民工作，当时我与从鄂豫皖苏区出来的陈赓见了面，并交流了情况，但不久因陈赓为叛徒守候而被捕，去鄂豫皖的交通线暂时中断，故没有赴任。因我回国前受过赤色职工国际工会工作的训练，中央局就叫我参加江苏省委抓工联工作，同上海工联的熊天荆和徐时惠（海员工会）联系。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章汉夫。

一九三三年五月，熊天荆、徐时惠夫妇和章汉夫等被捕了，省委和工联都遭到破坏。中央局指定我接替章汉夫任江苏省委书记。当时省委宣传部长是冯雪峰，组织部长朱阿根（工人出身，曾去苏联学习），秘书小顾，内交李一纯，省委秘书处设在新闸路某弄内。中央局指示我们首先恢复区一级的工作。我负责联系沪东区，

区委与我接头的是机械厂工人老李；冯雪峰负责联系法南以及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等团体；朱阿根联系沪中、闸北；小顾跑沪西；李一纯专门跑省委书记家。省委同中央局联系、开会的地点一度设在北京路上，外面开设一木器家具的出租店作掩护。住机关的同志是一位无锡大嫂，店面由一位叫小张的男同志负责。后来因感店铺进出不便，又迁至沪西康脑脱路（现康定路）底的春江别墅内。

六月间，设在新闻路上的省委秘书处机关遭到破坏，秘书小顾和内交李一纯被捕。于是省委机关即迁到沪东区的东熙华德路（现东长治路）一条弄内，由巴本（又名子才，现名杨光华）任秘书长。根据中央局秘书处通知，我曾到四马路（现福州路）一旅社内与两位从北方调来的女同志接头，一位转送中央局任内交，另一位女师大学生，化名“小妹”留省委任内交，同巴本住秘书处机关。不久，中央局又调李抱一到省委来指导组织部工作，中央局原来准备让李抱一熟悉一段情况后调走朱阿根的，但历时不久，中央局又将李抱一调走了。

上海工联遭到破坏后，中央局从北方调来孔二（又名赵林，孟庆祥，天津裕华纱厂工人）和老李（北平财政部印刷厂工人）负责工联工作，孔二任党组书记兼主席，老李任组织部长。我同孔二联系。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们同团省委恢复联系。当时团组织尚未遭受大的破坏，青运和学运工作进展都比较好。团省委书记小朱由我联系，他家在北四川路底川公路一条弄堂内。这时，省委领导下的各级组织已基本上得到恢复，当时党员人数，估计在两千人左右^①。

八月间，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发动反帝大同盟、

^① 据1933年12月3日江苏省委组织部报告，这时上海党员人数为614人。

左联、社联、民权保障同盟以及工联等组织，到外滩码头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欢迎群众有二三百人。宋庆龄代表各界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在群众的护送下，代表团住进华懋饭店。反战会议开得很成功，召开前后有少数人被捕，反帝大同盟的书记刘芝明也被捕了，刘的职务由社联党组的李剑华接任。李系复旦大学教授，曾留学日本，但不久，李又被捕。

一九三三年底一个傍晚，我同冯雪峰去瞿秋白家传达中央局调秋白去中央苏区的决定。当时秋白和杨之华住在黄陂路鸣琴坊内某号三楼，临街是小吕宋洗衣店。

由于在上海认识冯雪峰的人较多，中央局考虑到冯的安全，决定将他调往苏区工作，并指定由李默农（廖梦醒的爱人）接任宣传部长，仍由我联系。一九三三年底或一九三四年初，中央局又调走组织部长朱阿根，派中央局组织部的老于（即于昆）来接替，在传达这一决定的省委会议上，老于还代表中央局组织部批评了省委工作的官僚主义，主要针对恢复组织工作进展太慢和没有发动群众斗争来配合苏区的农民运动。从此，省委工作会议由巴本家改在老于家召开，地点在周家嘴路附近，距巴本家不远。

一九三三年底，中央决定将全总从苏区迁回上海，我调任全总党团书记兼秘书长，小姚（饶漱石）任主席。我们在上海建立迎接全总迁回的筹备机关，同时也作为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一起研究工作、举行会议的秘书处，因此地点的选择必须是适合外国人进出的地方。起先，地址设在忆定盘路（现江苏路）明星影片公司对面，后来又迁往今东湖电影院前面海关外籍职员住宅弄内一幢三层楼洋房。我同傅继英住三楼，二楼由老于爱人领着八岁的女儿同住，底楼作会客室，会客室后侧小间由伪装娘姨的朱阿根大嫂独居。每次开会前，先用电话与国际代表联系好，候小姚与中央局代表盛忠亮到达后，再次去电话通知国际代表前来，如发生情况即用

事前约定的暗号告知，同时，三楼窗帘还设有警号。

我调全总后同省委已没有联系，只知接替我担任书记的是原工联的孔二，李抱一（化名苏华）任组织部长，其他人员没有大变动。巴本仍担任秘书长同“小妹”住秘书处机关。大约在全总机关建立一个半月之后，老于爱人带着女儿搬来，说老于已出事，但对省委情况不详。后盛忠亮曾告诉我，孔二被捕后叛变了，充当敌人的鹰犬，在马路抓同志，要我戒备。最近巴本来信也谈到当年我离开省委后的情况：“孔二任书记，只三个来月就同苏华一同在中央机关被捕了。接着是‘黑大汉’（即赵立人）自称为书记，执行一条什么新组织方案。我竭力反对该有害方案而被撤销省委一切职务，交中央局处理，不久就解决问题，重新分配工作。‘黑大汉’那届省委不久就被破坏得一干二净。我被任命帮助新省委的组成，但由于情况变化，我调离了上海。”

一九三四年六月廿六日，盛忠亮派我去江苏省委书记“黑大汉”家索取关于无锡出现游击队的情报。当时，“黑大汉”住在康脑脱路，我被守候在那里的叛徒孔二率领的敌特所逮捕。同天被捕的还有送文件的内交“无锡阿妹”，傍晚“黑大汉”也被押来，一同关在戈登路捕房受审。次日被押到成都路捕房。第五天被押到租界法庭受审时见到李竹声，才知道中央局也遭破坏。我们被引渡到南市国民党公安局，我曾同李竹声关在一个牢房，后来又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

当时，江苏省委工作由上海的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局先后担任书记的李竹声、盛忠亮是王明宗派的骨干，他们不顾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一味开展斗争，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几乎到处碰壁，困难重重，打不开局面就埋怨群众落后，有时还强迫命令，常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陷于孤立，给敌人破坏斗争以可乘之机。一九三三年八月，我们曾在西藏路北京路口的中法大药房前举行过一次反战和

支援红军反“围剿”斗争的飞行集会，散发传单。我身任省委书记，也得装扮成阔少，手提了伪装糕点而内藏传单的礼物包，从北四川路底出发，通过两道巡捕搜身的警戒线，赶到集会地点。那次汇集约两百多人，开会不到十分钟，就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而散去。当时沪东区委书记老李就曾坦率地对我说：这样脱离群众的搞法，是白白牺牲党员干部，使组织遭到破坏！当时我对王明那套“左”倾冒险主义做法并没有什么认识，不认为它是错误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确感到群众很难发动，一般运动大部分都是左联、社联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人群众很少，区里工作也很难推动。

后来，敌人与租界当局勾结起来，采用盯梢跟踪的办法来侦破党的秘密机关，或利用叛徒四出搜捕，守候马路抓人，还通过威胁利诱个别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充当内奸，隐藏在组织内部搞破坏活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许多党的负责干部被捕，其中一些贪生怕死之徒相继叛变革命，出卖组织，使机关不断遭到破坏。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任省委书记的王云程被捕叛变；五月，章汉夫被捕；以后孔二、“黑大汉”相继被捕叛变；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央局组织部长黄玠然被捕；六月，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向敌人献出苏区寄存上海的窖藏黄金；十月，接替李任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被捕叛变，出卖了红队的五名同志。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不断遭到破坏，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

（上海历史研究所 李小苏、舒颖云一九八三年十月访问整理）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 南京地下工作片断回忆

刘 季 平

一九二八年夏季至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在南京参加地下党工作，这一段地下工作的经历，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我认为，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以前，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是比较正确的；在这以后，主要是在合并党团组织、成立红五月行动委员会以后的几个月内，就越来越陷入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结果使党在那年夏秋准备南京暴动中遭到惨重的损失。

中共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支部

一九二八年春季，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收了第三期学生。学生中有由江苏如皋师范及浙江台州地区各校转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十来人。我和石俊、马晓天、汤藻、马名驹等是由如皋师范转学来的共产党员，叶刚、徐一冰、郭凤韶等是由浙江转来的。我们的组织关系转到南京后，同年夏季，市委就在晓庄学校建立了党团支部，我和石俊先后担任支部书记。其后一年多时间内，又先后由北平、湖南、福建、河南等地转来了几个党员，并在晓庄同学中发展了一些新的党、团员，使这个支部成为当

时南京比较活跃的地下组织之一。

在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晓庄支部认真地分析晓庄的具体环境，商定工作方针。当时，我们对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中重视社会、生活，重视平民（特别乡村农民）教育，提倡发挥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创造性以及发扬民主、科学精神等许多具有新民主主义思想因素的进步性认识很不足，而简单地认为他强调“锄头革命”，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强调教育救国，不谈政治斗争，因而认定他是“改良主义者”。但另一方面，我们已注意到，在当时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国民党首都，他不跟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不反共、反人民，却立志改造传统教育，毅然离开高等学府而赤脚下乡，抱定决心要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办一百万所乡村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在晓庄学校那个小天地里，同南京城里，同许多其他学校里的气氛完全不同，我们这几个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员，也能无拘束地发表意见，进行活动。陶行知先生对大家的政治思想从不横加干涉，他对师生中一些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言行表现，常取放任的态度，或作些幽默的解释，因此，我们认为他又是“自由主义者”。市委当时指示我们，暂不要反对陶的“改良主义”，而要充分利用晓庄的自由环境，打击反动势力，发展革命力量。

晓庄学校的绝大部分师生，都是赞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而来的，但校内除我们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党派力量，最突出的是国民党与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只有几个党员，成立了一个属于国民党江宁县党部领导的晓庄区党部。区党部的负责人是第二期的学员方与严，原属国民党改组派，但没有跟汪精卫背叛革命，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很不满，同江宁县党部也貌合神离。国家主义派没有公开成立组织，但在这所学校里，国家主义派的危害较大，他们有一个头目叫杨效春，是全校生活指导部主任，实际上掌

握着学校教务与训育大权，仅次于陶行知先生的地位，活动能力也较强。我们如公开反对国家主义派，可能争取更多同情者，比公开反对国民党好办。因此，市委要我们先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设法赶走杨效春，对国民党则采取力求分化的方针。我们照办了，工作颇顺利。当我们利用壁报、座谈会等方式批驳国家主义派的谬论并联系到杨效春的一些言行时，不仅同学积极赞成，还得到生活指导部另一负责人张宗麟先生的支持。国民党区党部的方与严也发表了一次演讲攻击杨的言论，陶行知先生对这些仍采取不加干涉的态度。这样，到一九二八年冬季，杨效春不得不自动辞职，离开了晓庄，国家主义派在该校就从此未再抬头。

对国民党，我们一面把方与严和其他几个国民党员区别开来，与他交友，争取他继续向左转（后来到抗日战争期间，他终究脱离国民党，加入了共产党），一面利用各种机会，削弱国民党的影响，未作过高要求。国民党在该校师生中不得人心。晓庄学校用房较紧，而国民党区党部独占了一间办公室，门口挂了牌子，却经常锁着，师生对此表示十分不满，我们在商得方与严同意后，把它改为公用房屋。区党部另外几人也无可奈何。晓庄的宿舍管理，是由师生公推一名村长负责的，规定外来客人留宿必须先向村长报告。一天，国民党江宁县党部一官员未报告村长擅自留宿下来了，夜间巡逻队发现后照样对他盘问了好久，直等到方与严来说明情况后才放行。还有一次是蒋介石游览燕子矶，那天生物学家秉志（农山）先生正在燕子矶头给学生讲课，秉志先生明知蒋来此，也不肯回避，而且在蒋介石一行人经过时，仍照常讲下去，不予理睬。那天我也在场，目睹此事。陶行知先生听说此事后，也只哈哈大笑了一阵。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支部对陶先生教育上的一些有益活动，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利用这些机会开展工作。陶先生决

定成立生物组，建立生物室，我和石俊都参加了。除一般课程外，我们还根据秉志先生的建议，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如请挖草药的老人带领师生去采集草药标本，请捕蛇者带领师生去捉蛇并加以培养繁殖等。这些生动的活动还吸引了晓庄附设的劳山中学等校学生参加，使生物室逐渐变成了我们支部秘密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陶先生在大路边余儿岗办了一个中心茶园，作为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的基地，又在附近和平门、中山陵园等处，先后开办了好几所中心小学。我们支部也派了一部分同志去参加各种活动，如经常派人到中心茶园表演说书，抽出汤藻、马名驹等到陵园小学任教等，并努力把这些地方变为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点。此外，由于当时南京附近的社会治安不好，陶先生发起成立晓庄联村自卫团，我们支部就积极支持筹建自卫团。陶先生和冯玉祥先生的私人友谊很好，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是冯玉祥老部下鹿钟麟，冯、鹿对此均表赞成，很快就拨来了几十支步枪和几箱子子弹。晓庄联村自卫团正式建立了并商定由武术教师韩凌森先生任总指挥，我任副指挥。晓庄自卫团成立那天，冯玉祥先生还亲自赶来举行了授枪仪式。

由于我们采取了既慎重又积极的态度，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开展工作，党在晓庄学校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大，和陶行知先生及全校绝大部分师生的关系也相处得较好。这一期间，又有一些共产党员由各地转来，如湖南的陈佩之、北平的胡尚志、福建的廖履冰（女）等，河南也转来一党员（姓名已忘）。我们也陆续发展了一些新的党团员，如陆维特（党员）、袁咨桐（团员，已牺牲）、姚爱兰（女，团员）等。这样，到一九二九年冬，支部已有共产党员十多人，共青团员十多人，工作开展也颇顺利。

象晓庄这样的支部，在当时南京并不是个别的。就我一九三〇年初调到南京市委宣传部时所了解的部分情况看，就有十多个这样的相当坚强的党团支部。有战胜了国民党的屠杀、破坏而保

存下来的；有经过艰苦工作逐步恢复整顿的；也有重新建立发展的。其中较重要的有当时市委书记王文彬直接联系的下关和记洋行支部、浦镇铁路大厂支部，由团市委书记韩均联系的东方中学支部以及我联系的中央大学支部（支书黄祥宾）、金陵大学支部（支书刘大伟即刘列），市委秘书谭藉安（或是李则纲）联系的印刷厂工人支部、黄包车工人支部等，甚至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队里，还有由市委军事委员杨子庄分工联系的在国民党某宪兵连里的支部、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里的支部，以及在国民党首都警察厅下面的警察支部等。这些支部的组织生活都相当健全，一般都能保持每周或两周开会一次，每次会议都有议程，一般先由联系人谈政治形势，再由支部汇报和检查工作，然后商讨安排下一段的工作。

各支部的党员都能经常团结联系一、二个或二、三个较可靠的党外群众，这些群众经常参加我们组织的一些活动，有的还能在某些方面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支持与帮助，例如中央大学就有一同学曾借给我一枚中大学生证章，并帮我在宿舍里安排了一个床位，使我既能在中央大学自由出入，有时还能住宿在那里。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反动势力很强的国民党首都，我们采取荫蔽工作的方针，并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尽力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工作开展得颇为顺利并很有成效。这说明，当时党的斗争方针和方式是正确的。

一九三〇年春支援和记蛋厂斗争

一九三〇年初，我调到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市委书记王文彬，松江人，店员出身，作风很民主。当时，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一再指示各地党组织要争取公开活动。市委研究决定学习上海，先从学校着手，布置有条件的学校支部尽快发动群众，成立南京自由大同